



投稿邮箱: zmcplb@163.com

责任编辑 赵登银 徐洪霖

探索实践

遵义日报

4版

2025年8月20日 星期三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贵州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升维

徐毅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国家战略提出以来已有5年的建设经验,其地区生产总值由最初的6.3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约8.6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由6.3%提升至6.5%以上,对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日益明显。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之一,重庆享有诸多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身份,正全力推进这一战略向纵深发展。贵州与重庆山水相连,黔渝区域合作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实现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升维,与重庆“核心”形成互补联动新格局,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强劲动能。

一、强化战略耦合,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彰显贵州担当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六个坚持”的战略要求,强调区域协调需打破地理边界,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产业深度协作。接着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要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主动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为重庆、贵州深化区域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发挥贵州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支点与交通枢纽作用。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腹地,是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桥梁,通过与重庆加强合作,贵州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交通区位优势,完善区域交通网络,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区域内的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为西部地区的开放开发和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两地产业协同与错位发展优势。

贵州在大数据、特色农业、矿产资源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与重庆的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等形成了良好的产业互补关系。两地在产业合作中相互支持与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提升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同时,贵州也积极承接重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区域间的产业协调发展。

加强政策协同、体制机制创新与引导。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又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拥有诸多国家顶层战略身份叠加,贵州应与重庆积极加强政策协同,共同探索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新模式。两地应在政务服务、市场监管、要素流动等方面加强协作,进一步打破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壁垒,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市场体系。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体制机制对接平台,促进区域间的政策沟通和项目合作,推动区域协同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迈进,进而提升贵州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竞争力。

二、探索黔渝合作的新路径,找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支点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黔渝能源合作。铁路方面,加快推进渝贵高铁、渝毕高铁以及渝遵城际铁路等项目建设,提高交通便利性和运输效率,为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航运方面,把渝黔乌江三级航道升级为千吨级通航设施工程,努力打通“黔货出山”的“黄金水道”;能源合作方面,黔渝电力互联互通与煤炭交易中心探索建设,为产业协同筑牢基础。

深化产业合作与创新。在现有产业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合作。建立联合研发平台和产业创新中心,共

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遵义市率先出台《遵义市特色优势制造业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方案》,提出到2027年力争在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设备等产业与成渝地区相互配套规模以上企业突破110家、力争产值突破175亿元,配套产业园区5个以上,初步形成区域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交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共同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创新资源在黔渝地区的布局。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建立人才共享机制,鼓励科技人才在两地之间合理流动。定期举办科技创新论坛和人才交流活动,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两地科研院所也应积极加强合作与协同攻关,为黔渝科技创新与人才交流做好服务。

促进两地生态屏障建设与绿色发展。贵州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2025年5月,重庆与贵州签署《乌江流域黔渝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以“总磷”为核心指标(以0.05毫克/升为限),建立双向补偿机制,形成“成本共担、效益共享”的治理模式。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了对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横向补偿机制全覆盖,累计拨付跨省补偿资金超7亿元,也为黔渝在“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合作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两地吸引投资和留住人才提供了重要优势,促进了区域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三、借势重庆战略赋能,提升“黔货出山”国际化水平

推动黔渝消费金融等领域升级。贵州应借助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西部

金融中心城市”等国家特殊战略赋能,深化消费金融协同升级。

推动消费金融协同升级。建议两地联合设立“渝黔消费协同基金”,重庆5000亿元服务消费再贷款向贵州企业开放异地申领,贵州配套批零住餐贷款突破2000亿元。探索共建企业融资白名单实现跨省授信互认。贵州企业凭电商订单(如辣酱月销20万瓶)可获重庆银行300万元“黔货供应链贷”;重庆国际物流分拨中心与贵阳保税仓打通仓单质押系统,推动黔货前置仓享受“一仓两补”(物流成本降20%+政策奖励500万元)。

构建跨境支付便利通道。支付结算领域共推“乌江消费走廊”费率优惠,借助重庆跨境支付试点,贵州刺梨出口结算周期从15天缩至T+1。数据赋能构建“成渝黔消费数据链”,京东/淘工厂销售数据直连金融机构,实现“销量换额度”精准风控。通过金融生态共建,贵州辣酱等产品在渝销量翻两番,印证“政策导入+场景落地”的双向赋能价值。

打造黔货品牌展示窗口。借助重庆举办购物节、美食节、国际消费季等活动的契机,贵州积极组织本地特色产品企业参与,设立专题展区,打造黔货展示窗口。通过举办品鉴会、推介会、直播带货等活动,提升黔货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和购买黔货。贵州应探索与重庆的品牌营销机构和媒体合作,共同开展黔货行品牌塑造和推广活动。利用重庆的广告资源、媒体渠道和营销平台,宣传贵州特色产品的优势和特色,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黔货品牌。

完善物流配送与政策支持体系。与重庆的物流企业合作,建立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确保黔货能够及时、准确地送达消费者手中。加强冷链物流、仓储设施建设,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和质量,降低物流成本,提升黔货的市场竞争力;用好国家政策支持,

黔渝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对黔货出山项目给予支持和保障。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同时,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市场秩序,为黔货出山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四、破解发展障碍,推动黔渝协同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打破政策协同障碍。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建立常态化的政策对接机制,确保两地政策措施的衔接和一致性。共同研究制定区域合作政策,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环境。

消除要素流动壁垒。努力消除行政壁垒,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强要素交易平台建设,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强产业规划和引导,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明确产业分工和布局,形成差异化发展态势。建立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产业优势互补。

破解市场分割难题。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合作,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区域统一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促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信用信息共享,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总之,贵州要找准自身定位,借助国家重大战略资源,与重庆携手合作,共同破解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障碍,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取得更大成效。

(本文系茅台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课题“贵州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MYZSK202308]成果,作者系茅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以领导方式转型激发基层善治动能

罗鑫

在基层工作中,一些年轻干部因“亲力亲为”广受好评。这既体现了责任担当,也暴露出治理现代化中的深层问题——领导职责的错位与越位。

诚然,在应急处突、重大任务攻坚等关键节点,“亲力亲为”有助于快速破局。但若固化为常态,则弊大于利。其一,抑制队伍活力。领导事必躬亲,导致权责模糊,挤压下属成长空间,弱化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滋生依赖心理和路径惯性。其二,弱化核心职能。领导者陷入琐事,难以聚焦谋全局、抓重点、带队伍等主责主业,在复杂局面中战略引领能力被削弱。其三,潜藏履职风险。权责错配造成授权虚化、程序空转,一线干部有责无权,干事热情受挫,甚至出现“责任悬空、落实脱节”的治理断层。

究其根源,既有主观认知偏差,也有客观机制制约。部分干部存在“怕出错、怕追责、怕失控”的心理焦虑,偏好“亲自主手”以求稳妥;“万无一失”的结果导向和避责心态进一步强化了微观干预倾向。更深层原因在于:基层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下属失误易引发领导连带问责,加剧“安全偏好”;一些上级部门“一竿子插到底”,打乱层级管理秩序,客观上助长了基层对“包办式”领导的依赖。加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压力,年轻干部更易选择“亲力亲为”规避风险。

因此,推动领导方式从“亲力亲为”向“放权赋能”系统转型,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紧迫课题。

领导者亟须深化组织信任认知,视团队为能力沃土。辩证看待干部成长过程中的必要“试错期”,视其为淬炼能力的过程。同步推动基层容错清单化管理,明确“无意过失”与“失职渎职”界限,减少领导因“怕连带问责”而不敢授权顾虑。制定清晰权责清单,科学区分“必须领导牵头”“可授权下属执行”“需协同推进”三类事项。如,在信访调解、项目落地、政策宣传等常规工作中明确权责界限。及时肯定阶段性进展成效,将对授权事项必须监督转化为赋能让下属动力源,提升团队效能。

领导者须恪守职责本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核心准则是“授权不干预、到位不越位”。须力戒事无巨细发指令、过度介入操作环节的微观管理,警惕以“指导”之名行“代办”之实的越位行为。要打破这种“层级错位”,领导者首先要“退回”自身岗位,上级不越位干预下级的具体操作,基层领导者也不包办下属的执行细节,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有担当”的良性循环。唯有从操作层抽身,将精力投注于高站位、广视野、系统性与前瞻性的牵引性工作,方为恪尽领导本职,为团队赋能、提升治理效能奠定基础。

赋能需精准运用方法。基于权责清晰基础上,科学设定目标、保障沟通顺畅、强化过程支持、把握方向节点,进行建设性反馈即肯定有效做法并精准提出改进点。如建立定期工作调度机制,聚焦“进展成效”与“梗阻难点”,领导者角色定位于思路点拨、资源协调与障碍清除者。目标设定需结合工作实际与下属能力,细化可量化、可达成、可考核的具体指标。领导者要善于抓总揽、抓重点、抓关键,回归战略引领者定位,集中精力聚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识别培育骨干力量,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跨部门高效协同,为干部松绑赋能保驾护航等战略牵引性工作。

推动领导方式成功转型,核心在于打破“亲力亲为”路径依赖。通过刚性制度厘清权责,校准考评标准、强化正向激励,让善放权、精赋能、强统揽的领航型干部脱颖而出。其本质是以清晰规则取代模糊干预,以充分信任激活主体动能,以科学赋能锻造团队战力。最终,将基层实践智慧、改革锐气,全面转化为治理现代化强劲动能,构建起“领导归位战略引领、干部活力充分涌流、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的基层善治新生态,让治理既见效率之实,更显温度之光。

(作者单位:红花岗区纪委区监委)

学习与思考

用品质与诚信夯实白酒行业发展根基

赵 焱

当前,白酒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市场环境日趋复杂,消费需求持续升级,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仁怀市酒业协会发布《仁怀产区酱香白酒行业自律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正当其时、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尊重,更是对行业长远发展的负责。唯有以匠心守初心,方能赢得市场长久信赖,推动产业回归以品质为核心的健康发展轨道。

诚信经营,重塑市场秩序。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信用经济。诚信守法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倡议书》明确提出,要杜绝虚假宣传,产品推介必须客观真实,不得夸大功效、虚构工艺或暗示医疗作用;严禁使用“特供”“专供”“内供”等违反广告法的敏感标识;不得伪造获奖荣誉或冒用行业协会名义进行背书。这些举措有助于净化宣传环境,引导消费者基于真实信息理性消费。

同时,要坚决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严禁通过低价倾销、仿冒名牌、伪造产地等方式扰乱市场

秩序,共同维护仁怀酱酒的品牌价值和区域声誉。规范渠道管理,强化对经销商、电商平台等销售环节的监督,确保产品流向清晰、可查可控,严防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产区品牌形象。只有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才能依靠品质和服务赢得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

强化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更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倡议书》强调建立消费者快速维权机制,设立投诉专线,对质量问题做到第一时间响应、溯源、整改,主动履行退换货和赔偿义务,体现了行业对消费者权益的高度重视和责任担当。

推动行业透明化建设,鼓励企业主动公开生产工艺、质量检测报告等关键信息,自觉接受媒体、消费者和社会监督,是行业自信的体现,也有助于提升公众认知度与信任度。要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常态化开展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质量意识教育,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为行业高质

破除“订书钉困局”,让基层轻装上阵

董 涛

一枚小小的订书钉,本为固定文件而存在,却在一些地方演变成束缚基层的“形式主义枷锁”。材料厚度、装订规范、台账精美度竟成考核硬指标,干部疲于补材料、填表格,群众却难见政策实效——这种“订书钉困局”,正是形式主义的一个缩影。

表面上看,是文件装订、报表填写的“技术问题”,实则是形式主义异化的深层顽疾。一些地方将“留痕”当作“落实”,把“开会”视为“重视”,导致工作重心偏移。近期,某地在排查街道、村两

级承担的报表台账时发现,仅一个部门就有20个报表系统、500多种报表、9000多个指标,真正下沉一线、服务群众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当“材料政绩”取代实干成效,不仅浪费大量行政资源,更催生“一人干事、三人督查”的怪象,治理陷入低效空转。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材料艺术”正在悄然侵蚀干群关系。群众关心的是问题有没有解决、政策有没有落地,而不是台账是否整齐、汇报是否精美。当干部忙于应付检查、闭门造车,群众诉求自然被搁置。久而久之,“政策在文件里打转”的印象便在百姓心中扎根,政府公信力受损,治理根基动摇。

形式主义还扼杀了基层活力。在“唯上不唯实”的压力下,干部不敢试、不敢闯,只求“不出错”,不愿“出成绩”,创新动力被层层报表和重复检查消磨殆尽。这与新时代基层治理所需的灵活性、回应性背道而驰。

破局之道,在于制度革新与治理转型双管齐下。首先要重构考核体系,从“重痕”转向“重绩”,

从“看材料”变为“看实效”。推行“非必要不检查、非必要不报表”,建立工作事项准入机制,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放出来。

其次,善用数字化手段,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一表通用、一网通办”,让信息多跑路,干部少填表。

最后,更要培育崇尚实干的治理文化,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者撑腰,让真抓实干者有作为。

基层是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应成为形式主义的“重灾区”。唯有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才能让干部轻装上阵,把精力用在为民服务的刀刃上。破除“订书钉困局”,不仅是一场作风革命,更是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新蒲新区宣传统战部)